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八五期 ——  
(二〇一一年二月七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102a)

---

【史林一页】	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	尹曙生
【人物春秋】	吴新潮回忆父亲吴法宪	纪 彭
【几曾回首】	李文化：江青“御用摄影师”悲欢史	张 欢·印 青
【各抒己见】	“刘邓路线”的“前世今生”	缪一轮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林一页】

### 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

• 尹曙生 •

1966年夏季，“文革”之风吹遍全国，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到处打、砸、抢、抄、抓，社会秩序混乱至极。1967年1月17日，安徽省2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十条紧急通令”：“勒令省委、合肥市委、省公安厅、合肥市公安局和全省公安机关，停止办公，接受群众组织指令，违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实际上，这时候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在造反派组织的冲击下，已经陷于瘫痪，不能正常行使职权。

公安机关的瘫痪，使得社会秩序更加混乱，犯罪分子乘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社会秩序严重失控，人民群众惶惶不可终日。有些犯罪分子冒充红卫兵，以扫“四旧”、搜查、抄家的方式，大肆入室抢劫。仅1967年1月25日夜里，合肥市就发生这类抢劫案27起，被抢劫37家，受害者都以为是造反派扫“四旧”，不敢反抗，不敢报案（即使报了案，也没有人管），有3名省、市领导人人家被冒充红卫兵的劫匪以抄家名义抢去财产4万多元；一位副市长稍有微词，被打伤住院。一时间，分不清谁是红卫兵、造反派，谁是拦路抢劫、入室抢劫的犯罪分子。这么混乱的状态对“文革”本身肯定也是不利的。1967年3月11日，安徽省军区根据南京军区指示，对安徽省公安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公安厅军代表办公室”。

紧接着，1967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决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指示：“立即接管（省）公安厅、公安局，彻底揭露这两个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1967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重新派出21名军代表，接管省公安厅，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安徽省公安厅军代表办公室”。这两次对公安机关的军管，没有能解决社会治安混乱的局面。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立即对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措施，于是，1968年1月8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600多名干部战士，对全省95个县以上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省和地、市、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建立的“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和军管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从此，军队牢牢掌握了公检法机关的全部权力。一万多人的公检法机关干部职工，除极少数人留下外（公安厅500多名干部只留下23人），其余组织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班”，以后下放农村搞斗、批、改，揭批公检法机关的“阴暗面”。省公检法军管会提出对原公检法机关“组织上彻底砸烂，人员上彻底清理，工作上彻底揭露，路线上彻底批判”的四“彻底”办法，进行“彻底改造”，也就是“彻底砸烂公、检、法”。

这600多名军人对公安工作业务不熟，人数又少，无法担负维护全省社会治安的重任。怎么办呢？只好借助群众力量，于是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组织应运而生。1968年4月10日，在军管会的支持下，全省第一个群众专政组织——“合肥市文工武卫指挥部”正式成立。5月14日，省人保组（军管会）正式发出通知，要求“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在工矿企业单位，组织群众专政队伍，武装产业工人，把群众专政组织建设成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人保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大打人民战争，清理阶级队伍，把暗藏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分子统统挖出来。”省人保组（军管会）通知发出后，到1969年春天，群众专政组织遍布全省城乡每个角落，队员发展、膨胀到110万人，它的统一名称是“安徽省××市、××县、××区、××公社群众专政指挥部”。单位和生产大队名称则是“××单位、××大队群众专政大队”。指挥部设正、副指挥，正副政委；指挥部机构内设政宣、指挥、参谋三个组。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采取集中住宿，有专人负责后勤保障；有些厂矿企业单位，仿照军事建制，设立群众专政指挥团（营、连、排、班）。所有群众专政组织必须接受市、县群众专政指挥部统一领导和调遣，而市、县群众专政指挥部接受同级人保组（军管会）领导和指挥。

省、市、地、县人保组（军管会）授予群众专政组织有权对杀人、放火、投毒、强奸、抢劫、偷盗等刑事犯罪案件，可以不经过任何批准手续，立即采取扣留、关押等强制措施，然后向军管会（人保组）报告；发现所谓有违法活动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有权扣押，组织群众批斗后，实行群众专政（劳改、做苦工）。县以上群众专政指挥部对他们认为的违法犯罪人员有15天的扣留审查权。至此，群众专政组织俨然成了合法的专政机关，为日后无法无天披上合法外衣。

安徽省群众专政组织存在的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在军管会（人保组）领导下，先后对150多万人实行群众专政（其中包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清出来的40多万“坏人”）。那些被专政的对象，遭到残酷批斗、毒打，受尽折磨，其中有18万多人被非法长期关押、拘禁，最长时间的达3年2个月，直到1971年6月7日省革命委会通知撤销群众专政组织时，仍有5万多人被非法关押在群众专政指挥部。

1967年9月5日，康生、江青等人在接见安徽省两大造反派组织头头的讲话中，直接点了混进两派组织里面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名单，要他们各自揪出混进本组织里的坏人。1968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中指出：“安徽省的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掩藏在

安徽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疯狂进行垂死挣扎和破坏……中央希望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批倒批臭。”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第一次全委会讨论通过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前进，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决议提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清理阶级队伍，把混进党内和群众组织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下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为安徽省清理阶级队伍提供借鉴，为此省革委会又作了一系列部署，清理阶级队伍在安徽省轰轰烈烈搞起来了。而担负这项工作的主力军就是遍布全省的群众专政组织。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种“坏人”43万多人。

这些“坏人”是怎么清理出来的呢？省革命委员会清队领导小组提出的清理对象是：“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方还把“小爬虫”、“变色龙”、“铁杆保皇分子”、“黑干将”、“爪牙”，等等，作为补充清理对象。省清队领导小组提出，对清理出来的“坏人”要求“从政治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大会批态度，小会短兵相接（武斗）”。于是打骂、体罚，刑讯逼供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使用的酷刑手段有几十种、上百种，有的比《红岩》小说所描述的“渣滓洞”、“白公馆”还要残酷。笔者不愿意摘录那些惨无人道的酷刑，以免污染人们的灵魂，只公布清队造成的恶果，让人们自己去反思。到1969年4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43万“坏人”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188225人，这些人因忍受不了刑讯逼供而在关押期间自杀的就有4646人，被群众专政人员用棍棒和其它刑具当场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伤而死亡的359人。

下面用一些地方、单位、个人做案例，进一步加以说明。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霍邱县是重灾区之一。1968年5至9月，全县在“清队”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杀445人。该县长集区“专政对象”刘××、曹××，因忍受不了刑讯逼供，就说自己藏有枪支，准备暴动。群众专政队信以为真，要他们带着去挖。先挖了3处都没有挖出枪支，于是挖了第四处，仍然没有挖到枪支后，专政队员一气之下将他们两人活埋在他们自己挖枪的坑里。他们俩有什么问题呢？不过是在解放前被抓去当过几个月的国民党兵，被认定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经公社群众专政指挥部批准为专政对象，实行群众专政。

某市委机关共有干部职工371人，被揪斗、批判154人，其中专案审查的47人，1978年全部平反，没有一个人有问题。某地委机关干部、职工235人，被清出96个“坏人”，“文革”结束后，除5个人积极造反，有打砸抢行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余全部平反。淮南某矿工医院113名职工，清理出来的专政对象50人。为了查清这50人的问题，仅专案组成员就有41人，最后一个坏人也没查出来。马鞍山钢铁设计院978名职工，被揪斗134人，大多数人是专家、技术权威，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坏人。合肥××大学教职工327人，被清出192个“坏人”，其中讲师、教授以上教学人员57人，党政干部45人，被逼自杀8人，最后查清只有2个人有些历史问题，但是在内部肃反中已经做了结论，不追究刑事责任。东至县在清队中清出58个反革命集团，成员3564人，其中贫下中农占73%。被打死、逼死37人，事后调查，全是假案。灵璧县在“清队”中，挖出了一个“特务网”案件，涉及4省、6市、9县、30个公社、12个县直单位，挖出所谓特务组织70个，特务分子1020人，其中逮捕、拘留18人，立案调查231人，关押审查965人。在办案中刑讯逼供致死120人（基层干部4人，国家干部职工16人，其余都是农民），致残146人（其中终身残废、完全失去劳动能力37人）。在抓这个特务网案过程中，县、社、队先后办学习班16

29期，被强迫进学习班的人数达到28.3万人次，占全县人口总数1/2。一段时间灵璧县成了一座大监狱。在学习班里，使用的刑罚50余种。东风公社范柳大队党支部书记谢××，被诬为特务组织政委，被刑讯逼供5天5夜死亡，埋葬后，还不解恨，又把棺材挖出来，围棺批斗3天。民兵营长田××被诬为特务组织司令，被活活打死。东风公社胜利大队党支部书记朱××被残酷批斗，他为证明自己清白，用菜刀剁下左手中指，用血写下保证书，保证自己不是特务，专案组仍不放过，他只好自尽。有的人被逼无奈；只好乱供，东风公社西山大队农民崔××被逼无奈，一口气供出特务140多人，把他认识的能讲出名字的人全供出来，其中有几岁孩子、几个月的婴儿。

如此荒唐的“特务网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还作为清队典型，于1970年初在合肥进行展览，让全省效仿。1978年此案彻底平反。

1968年6月10日，宿县地区石油公司一名副科级干部酒醉后卧床吸烟，引起火灾，被烧成重伤，抢救无效，次日死亡。当时结论是灾害事故。1970年“一打三反”开始后，派到该单位的工作组认为石油公司“清理阶级队伍”不彻底，需要补课，说死者是被他人有意放火烧死的，是“大贪污集团杀人灭口行为。”石油公司73%的干部职工受到残酷的刑讯逼供审查。全公司43人，22人被长期关押，3人被活活打死。经过2年审查，没有查出一分钱的贪污事实，所谓贪污集团杀人灭口不攻自破。可专案组并不死心，强令石油公司从银行贷款中提出2965.58元，冒充赃款，说明贪污集团存在。1978年该案得到彻底平反。

1969年11月13日，马鞍山第17冶金公司礼堂因电器短路失火，当时正是“清队”高潮，市人保组（军管会）认为是阶级敌人纵火，对公司6名所谓嫌疑对象隔离审查。就在这时，该公司一职工出差上海，与一妇女通奸，被上海市公安局军管会抓住拘留。公司派人带回单位审查，他在强大压力下，交代伙同另一职工放火烧了礼堂。礼堂失火时他不在马鞍山，明显是编造，可专案组却相信，将他供出的那个人也关押审查。为了过关，这个人交代自己参加了“中华民族新生党马鞍山区十七冶特别执行委员会”反革命集团。并编造出芜湖市、池州地区、马鞍山市、马鞍山钢铁公司一大批领导干部都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有地、市委书记，专员、市长，有公司经理，计划在马鞍山搞反革命暴动，已经从南京搞来5支冲锋枪、4.5万发子弹。因暴动未成，所以纵火烧礼堂。以军队干部为主的专案组信以为真，组织几百人进行侦查，发动群众专政组织大力协助，将712名人员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其中地、市级干部9人，县、处级干部17人，科级干部57人，工人630人；关押133人，被刑讯逼供自杀人8人，病死1人。1979年该案彻底平反。给全体受害者8万元生活补助，而没能追究冤案制造的责任，因为主要人员已调回部队工作。

在“清队”高潮中，安徽省和县水利局干部石仁祥，于1968年12月26日，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为题，写了一份传单材料，刻印8份，公开署名，寄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6份，自留2份。1969年1月6日，南京空军保卫部派出2名军官到安徽，向省革委会和人保组传达吴法宪（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对石仁祥信的口头指示：“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组织专人立即侦破，及时查清，查清后必须依法惩办，并查清这封信的扩散面，肃清流毒，不准再扩散。”1月7日省人保组派人同南京军区保卫部前往和县办理。由于石仁祥是用真名真姓真地址，找到本人并不难。8日下午传唤他，并当场宣布拘留，后逮捕。

石仁祥1959年参加工作，1966年应征入伍，1968年4月退伍到水利局工作。他揭发林彪的问题，有的是他自己的想法，认为“林彪心术不正，投机取巧，总有一天会反毛主席”；也有一些是他道听途说林彪历史有问题。专案组查来查去没有查出他有政治背景，没有人指使他做这件事，没有牵连到其他人，信的内容没有扩散。可是，1970年3月18日，

和县革委会讨论决定（法院已不存在——下同）判处石仁祥死刑，立即执行，巢湖地区人保组、省人保组（军管会）报省革命委员会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7月12日，和县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后将石仁祥枪决。安徽省革委会为此展开大规模宣传活动，声称这是“清理阶级队伍取得的一大胜利”。

仅仅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反映林彪问题的信，就被判处死刑，比封建专制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石仁祥案不是“文革”个案。张志新、林昭、遇罗克也不是个案。安徽在清队中被用棍棒活活打死的那1000多人，他们的遭遇比石仁祥还要惨。

在清队中，安徽还清出来一个全国最小的“反革命”，他只有9岁，是淮北市××小学二年级学生赵××，1968年12月5日因在作业本上写了“刘少奇万岁”而以反革命罪被拘留关押。因为他在拘留所哭闹，最后不得不在关了1个月零七天而释放，但是仍然定他为“反革命”。

1968年4月8日，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最能说明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荒谬性、残酷性，充分展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人性丑恶的大暴露。

“文革”开始不久，严凤英就以“三名三高”、“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成为批判对象，经过无数次“文批武斗”，受尽屈辱。在“红梅剧院”（为了突出革命性，“文革”开始后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改名为“红梅剧院”）军代表刘万泉的领导下，对她实行群众专政，大会批、小会斗，甚至把她在旧社会受到的种种人身迫害、侮辱，作为她的罪行，展示出来，进行批判，肆意进行侮辱。批斗的时候还要她的两个未成年孩子和丈夫到场，一同接受批判，以达到最大限度的人格和心灵摧残效果。根据省军管会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专案组捏造她反江青、抵制革命样板戏、潜伏特务三大罪名。她虽力辩自己清白，无奈有口难辩。在军代表、专案组的淫威下，她的老搭档、黄梅戏剧团主要演员王少舫（“天仙配”董永扮演者）为了自保，也贴出大字报诬陷她，使严凤英受到极大震动和伤害。4月7日晚，她服下大量安眠药，然后写遗嘱，准备彻底解脱。丈夫王冠亚发现后，报告军代表刘万泉，请求组织抢救。可刘万泉等人来到她家后，不是马上送医院抢救，而是在她的床头开批斗会，直到她神志不清、不能说话，才草草收场，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由于当时医院也在造反，秩序混乱，从安医门诊部折腾到安医住院部，没有救护车，全靠丈夫王冠亚从好心人那里借来的拉货板车拉来拉去，又耽误了些时间。到了医院，没有医生给予及时抢救，直到8日凌晨2时，严凤英带着满腔悲愤离开了人间。解放前，她因为忍受不了欺凌与压迫，曾经吞金、上吊自杀，都被即时发现抢救，幸免于难。可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却香销玉殒，永远离开了人间。全国人民心中那个美丽、善良的“七仙女”，死时还不到38岁，正是一个艺术家的黄金年龄。

人死了以后，军代表还不放过，率领造反派，赶到医院，要搜查严凤英的特务证据——发报机和照相机。胡说严凤英是接受特务机关指令而自杀的，发报机和照相机就藏在她的肚子里，要开肠破肚，搜出特务证据。尽管王冠亚强烈反对。也无济于事。刘万泉勒令医生扒光她的衣服，在他和4个群众组织头头的监督下，用医用斧头破开她的胸膛，把内脏扒出来普遍翻了一遍，除找到尚未完全消化的100多粒安眠药外，所谓特务证据子虚乌有。完全失去人性的刘万泉还悻悻地对着被污辱、肢解的尸体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演的黄梅戏，也没看过你演的电影，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你的原形。”

从刘万泉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在那疯狂、变态的社会，才能产生如此疯狂、变态的人。

我们应该谴责刘万泉，谴责那个疯狂、变态的社会；但是，我们更应该谴责制造如此疯狂、

变态社会的政策和制度。

□ 《炎黄春秋》2011年1期

~~~~~

## 【人物春秋】

### 吴新潮回忆父亲吴法宪

· 纪 彭 ·

吴法宪，前空军司令，开国中将。在通常人眼中，他是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对文化大革命负有责任，甚至纵容林立果在空军为所欲为，间接造成了林立果有机会进行谋害毛主席的阴谋。说实话，从前我对“黄吴李邱”也是这个看法。在和吴法宪的大儿子吴新潮约定了采访时间后，我仔细阅读了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对吴法宪多少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

2010年9月的一个下午，吴新潮在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的咖啡厅里接受了本人专访。他的身材和他父亲一样都是有些发胖，因此也就显得很随和。对于这次采访，吴新潮多少有些顾虑。

“父亲是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一般历史人物的子女，很难客观地公正的评价父亲。因为在子女的眼中，父亲都是完美的。实际上，大多父亲都并不完美。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但是世间应该说对他有太多的误解。这些误解反而给我们一些比较容易澄清的机会。”

#### ◇ 关于“草包司令”

我的父亲吴法宪是开国将领，但是与其他开国将领不同的是，父亲头上戴了两顶帽子，一个是林彪反党集团的帽子。这不是我们评价的范畴。今天我想说到的是另一顶帽子，也就是公众所传说的“草包司令”，甚至说父亲和戏剧里的胡传魁一样。草包司令是一个政治概念，把历史上的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善人和恶人。其实用简单的好坏以及道德观念去评价历史人物是很苍白的。历史上的“坏人”就是一切都坏，包括长相、吃饭的模样、生活上的一举一动啊，都是反面的。好人就是一切都好，一切都是光环。失败者就是垃圾箱，什么坏事都往里装。这是一个并不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标准。关于父亲是不是草包，张正隆的雪白血红里有这样一句话：林彪用人，用过好人也用过坏人，但是从来没有用过草包。刘震将军说：吴法宪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吗？

所谓“草包”一是说父亲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不会打仗。这不是事实。共产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军政工作是分工不分家的，所有的政委都参与军事指挥和打仗。有很多政委都担任军政一把手。以政治元帅罗荣桓和一直从事政治工作的肖华将军为代表的政委们都不会打仗吗。1935年3月，在四渡赤水前夕，父亲被调往红1师3团担任总支书记，团长是黄永胜。父亲报到的当天下午4点，红3团突然接到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晚上8、9点钟，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来到红3团，代表红1军团命令红3团今晚必须强渡乌江，消灭对岸敌人，占领渡口，为全体红军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在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年轻的政委在雨中训话，那就是父亲。他亲自带领部队一举夺取渡口，消灭敌人两个连，确保了红军得以突破乌江天险。战斗胜利后，红1军团政治部油印的《战士报》表扬了红3团的功绩，第1个名字就是吴法宪，那一年父亲

只有20岁。建国后，肖华曾把这次战斗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一书上。

长征中的父亲所在红1军团是红军的先锋，著名战斗父亲没有一次落下。父亲对我们说过身经百战是一点都不少啊。1936年5月18日，1军团奉命西征。6月1日到达曲子镇附近。马鸿逵部骑兵进了曲子镇，被红2团包围。2团在团长梁兴初和政委吴法宪的带领下，在镇东南角打开突破口攻城，马部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带人光着膀子举着马刀反击过来，父亲在城墙上指挥战斗被子弹击中掉下去，父亲说当时数一数身上的棉大衣穿了七个窟窿。这一仗全歼马鸿逵骑兵300人，毛主席亲自检阅了2团的队伍。红2团在红军中以能打硬仗而著称，每次有要紧战斗任务，林彪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2团。

父亲所在红2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685团，黄永胜和杨得志先后任团长；邓华和父亲先后任政委，这是在红军中打硬仗的部队，是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号称铁军的54集团军127师的前身。虽然父亲一直是做政委工作。可在革命战争中的大部分时期，父亲在都是部队党委书记，也就是一把手。1938年冬，685团后奉命东进，深入敌后，到达了山东湖西（微山湖）地区。组建了第一支深入山东的队伍——苏鲁豫支队，父亲是军政委员会书记，是一把手。到山东的时候只有2000人，部队扩编很快，仅一年多的时间到1939年，苏鲁豫支队就发展到13000人，共设4个大队，也就是团的编制，每个大队设4个营，此时苏鲁支队就是一个整编师的规模了。而同一时期和115师师部一起来到鲁西北和沂蒙山区的686团还是3000多人。

以当年的苏鲁支队为基础诞生了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王牌部队 一、以副支队长梁兴初率领四大队也就是原挺进支队，再加上几个连的兵力，由留在湖西坚持斗争，后来该部队发展到7000多人成为山东1师，开赴东北，组建东北野战军一纵，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8集团军。二、苏鲁豫主力部队1、2、3大队向豫东、皖北发展。整编为新4军3师7旅，到东北后改编为东北野战军6纵16师，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54集团军127师。三、1940年父亲调任新4军3师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员会成员，1946年3师35000人开赴东北组建东北野战军2纵父亲任政委和党委书记也是一把手。从苏北到东北这只部队成为东北战场林彪手下的头等主力‘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9集团军。这些王牌军都留下了父亲的心血与足迹，特别是担任这些王牌部队的主官能有几人。这么多的精锐之师，虎狼之师是一个草包能率领的吗。

另一个方面说“草包”指不同的性格、个性。如父亲的老上级刘亚楼将军个性强，刚烈，锋芒毕露，而父亲的个性比较随和、婉转。但是刘亚楼是对工作、对部队要求及其严格的人，号称雷公，是一位眼里不揉沙子的人。无论在还是四野还是在空军，广大指战员都知道，刘亚楼是一位用草包的司令吗。父亲与刘亚楼将军搭档十五年，组建和奠定了现代空军的基础。这样的搭档党内军内还有许多。这些不一而足。这样的性格都是草包吗。

#### ◇ 在东北发了洋财

2纵初到东北面临极其艰难的处境，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背靠苏联，遍地白面，洋枪洋炮。按照黄克诚给中央的电报说是七无队伍，即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干部战士冰天雪地一身单衣。2纵在刘震和父亲的率领下，在林彪和东总的直接指挥下第一次打冒进的国民党13军89师的四个营，全歼国民党部队3000多人，缴获新式武器无数这就是著名的秀水河战斗，第二仗是4月15日大洼战斗，打冒进的国民党71军87师的两个团，歼灭4300多人。两年的时间，经四平保卫战、伏龙泉，靠山屯、怀德、以及三下江南，夏秋以及冬季攻势、2纵打了一系列漂亮的翻身仗，做为党委书记的父亲直接

参与作战指挥。2纵从初期的3万人壮大到了7万人。真是兵强马壮。东北战场是东野各纵队能力与实力的大比拼，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合格的。打胜仗就是硬道理。由于2纵的业绩，林彪一直把2纵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成为林彪喜爱的部队。最辽沈战役中，2纵是打锦州主力，仗打得太艰苦，就没赶上打廖耀湘兵团。正因为如此，歼灭了廖耀湘之后，2纵就成了距离沈阳最近主力，林彪就直接命令父亲带2纵攻打沈阳，当时卫立煌跑掉了，未经大的战斗就进了沈阳。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补给基地，储备有大量的战略物资。这些“洋财”基本都被2纵划拉走了。父亲坐着小吉普，到处巡视，口口声声说“要给兄弟部队留一点”。可2纵7000多人，全都换了美式装备，一身的皮靴皮帽，人人发睡袋什么的，这些美式装备，当时，2纵上下是“上顿吃烙饼，下顿吃饺子”我有一件风衣、还有一件美国的毛衣都是那时的缴获。将近30年的时间扣子都拽不掉，当时产品的质量真好。一直用到“文革”。

父亲也知道这件事迟早会被追究的，于是在1949年1月，2纵内部开会，专门就此事商讨对策。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好。东总司令部后来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父亲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做了自我批评。其他纵队司令员政委们全砸了锅，羡慕的有，嫉妒的有，大家都说：“你这个吴胖子，怎么能这样啊？”还有的说“吴法宪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林彪在会上什么也没说，最后给了父亲一个处分。父亲也发了狠说：“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当时部队进城后，确实有点兴奋，也体现了军队骄横的一面。有一个叫刘银夏的团政委，因为抢医院，把1纵的人打死了。要交“东总”军事法庭，在押解的路上遇到了父亲。父亲就问：“什么事情啊？”听了事情原委之后，就发话：“我们2纵的人，我们自己处理，不用“东总”费心了。我宣布撤销政委，变为马夫。”这种处罚也是暂时的，一个月之后便官复原职。这个刘政委后来当了宁夏政法委书记，90年代，父亲受人之托打电话找他办一件事。当时，刘银夏已经病重，听说是吴政委来的电话，坚持站起身来，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敬军礼，说“报告，刘银夏听候吴政委指示”，父亲说“我已经不是政委了”，他就改口：“听候老妈妈指示”。老妈妈是父亲在2纵的别称，当时2纵官兵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困难找老妈妈，没饭吃找老妈妈”，2纵的人都知道他关心战士。可以说，父亲在2纵里的威望使大家都服气的。

#### ◇ 父亲与林彪

父亲是林彪的人，这是一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更重要的是“山头”，一直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父亲是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1军团，受到林彪直接领导，如果说1方面军就是毛泽东的中央军，红1军团就是“黄埔军校”。解放军中很多高级将领都是这支部队走出来的，例如：杨成武、刘亚楼、黄永胜、李天佑、李聚奎、肖劲光、杨得志等。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有12个纵队，父亲指挥的2纵是林彪最得意的一支部队。都知道林彪喜欢钟伟，钟伟就是2纵主力师的师长。2纵司令刘震对吴法宪有意见，说父亲纵容钟伟，是钟伟后台。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一些故事就是以钟伟为原型的。比如，“挖沟”战法（通过土工作业，接近地方阵地，减少攻击部队伤亡的战法）就是钟伟最先发明的。

打锦州的时候，1纵是总预备队，由2、3纵攻坚。当时林彪拿着望远镜，看着战士们往前冲，2纵的战士们前赴后继，死伤非常大，久经战阵的林彪都为之动容，竟把望远镜掉了，还连说了3句：“好部队……”

还有一件事情，更能体现父亲和林彪的关系。林彪的两个子女，都安排在空军，豆豆是刘亚楼安排的，老虎（林立果）是父亲安排的。1965年，刘亚楼病重期间特意把父亲叫到上海去交代把豆豆安排到空军报社，叫父亲给与照顾。林立果则更是叶群直接找到父亲安排在空



军党办的。不仅如此，林彪身边的很多人都是从空军调去的。

林立果到空军之后，父亲曾经说过，“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确实说得不妥，但是要分清，这个话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林立果找父亲汇报要在空军成立一个调研小组，父亲说：多了解空军的情况，多向林总汇报，你代表林总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是私下里说的。当然这话不对，说过了头，父亲肯定是有私心，但充其量就是吹捧。其实，即使说了“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林立果也不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要不然“九一三”的时候，为什么林立果只能偷偷调了一架飞机，弄了党办几个人？

不过，说父亲是林彪死党不冤枉。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父亲作了检讨。毛泽东想要撤换父亲，征求林彪的意见，“用空军的曹里怀成不成？”林彪回答：“还是得用吴法宪”，把主席顶了。

#### ◇ 恩师和兄长刘亚楼

在空军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刘亚楼，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司令。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父亲的老上级，为人又比较强硬，所以外间就觉得刘亚楼在空军一言九鼎，父亲就是个受气包，两个人不太和睦。其实不然，刘亚楼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父亲一直把刘亚楼当作恩师兄长

辽沈战役刚结束，部队要南下，父亲就去找刘亚楼商量，能不能叫2纵驻在沈阳，多休整一下。刘亚楼同意了。后来又去找他，说2纵能不能最后走，刘亚楼也说可以。为什么那么多部队就照顾2纵呢？很大程度上是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好。后来打天津，刘亚楼也是在2纵指挥部所在地杨柳青指挥战斗的。

组建空军的时候，刘亚楼亲自挑的父亲当政委，就是因为刘亚楼脾气比较暴躁，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当政委，他才点名把我父亲从调过来坐阵。在空军，父亲是刘亚楼的副手。空军流传“刘司令，无政委”的笑话，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原来的空军政委是肖华，肖华不久就到了总政，空军没了政委，刘就把吴调过来，虽然是副政委，但他的职务是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实际上就是二把手，肖华走之后，刘亚楼就给总政打报告，要求转正，肖华说了一句这回在空军是“无政委了”。

到空军之后，父亲跟刘亚楼配合的比较好，他不跟刘亚楼闹矛盾，空军干部被骂了就来找吴政委，政委就劝说一下。对司令不满意的，政委帮忙转达转达。到了1965年，刘亚楼去世之后，父亲就接替了司令，他挑了个政委，是余立金。大家又说现在是“余政委”，多余的政委。这些都部队里的笑话。

其实，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很好，每次父亲休养都是刘亚楼亲自安排，我母亲在民航工作，刘亚楼都是亲自给民航领导打电话，给我母亲请假。刘亚楼无论到哪里休养，如果父亲不去，他都会带上我，把我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刘亚楼出国访问，回国带的各种玩具，只要是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我一份。父亲不喝酒，刘亚楼喝的厉害，所以家里的酒叫我给刘伯伯送去，我就经常抱着酒到刘亚楼家。不过，我们孩子还是很害怕的刘伯伯，他那种威严叫我们孩子见了他都躲着走。

#### ◇ 文革期间和周恩来并肩作战

“文革”时期，政府机构都没了，就剩下军队的机构还可以运转，所以从三支两军，到全

国山河一片红都是“黄吴李邱”们在工作，都说周恩来在文革期间苦撑大局才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可是周恩来总不能一个人干所有的事情的吧，具体的工作还要靠军队系统的人执行，也就是“黄吴李邱”们去执行。所有的部长都倒了，“黄吴李邱”们兼任了国务院各部的工作，直到“九大”之后才慢慢正常化。当时支撑周总理工作的就是“黄吴李邱”们，周总理在当时手头也只有“黄吴李邱”们，周总理和“黄吴李邱”是一回事。那个时候，不仅是周总理，大家都很难。

自从“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基本上见不到父亲，他早上天不亮就走了，晚上天黑才会来，我记忆中就没几次在一起吃过饭。那时候，大家都跟着毛泽东的作息时间转，他喜欢半夜十二点开会，大家都得过去开会。父亲既要负责空军的工作，又要参与军委的工作，还要参与全国的工作，每天下午2、3点到军委办事组开会，之后有中央碰头会或者中央常委办公会，又开会开到凌晨，回来就抓紧时间睡觉。早上9点起床，抓紧时间搞一点点空军工作的“自留地”，赶紧又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空军的工作才逐渐混乱起来，才有了周宇驰、林立果他们的“小舰队”。

#### ◇ 庐山会议上的国家主席问题

“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能用的人，一边是林彪和“黄吴李邱”们，一边是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四人帮”。庐山会议就是斗争的一个爆发。从深层的背景看，这个斗争是对“文革”的不同看法。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由头而已。林彪是希望恢复国家的秩序，结束“文革”，所以有必要设国家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林彪、陈伯达3个常委都是支持的。汪东兴传出话来，也是这个意思。80年代，我问过父亲：“你反对江青，她是毛主席夫人啊，你这不是犯错误么？”，父亲说：“傻孩子，没有毛主席撑腰，我敢么？”父亲还特意问过汪东兴，“江青的这些东西，代表不代表毛主席”，汪东兴说“两回事，毛主席不喜欢他们”。大家都在揣测毛主席想不想当国家主席，汪东兴误导了父亲，父亲误导了林彪。

父亲在得到了这些信息之后，便和张春桥“吵架”，这个事情当时就报到北戴河，我当时在北戴河林彪家里，叶群把我叫到卧室，说你爸爸来电话了，说和那个“眼镜”（指张春桥）干仗了，你林伯伯说：“你爸爸放了一炮，放的好”。之后就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内容也是事先和毛泽东通了气的，毛泽东只是说“就不要点张春桥的名了”。讲话之后，周恩来提出放两遍录音（本来是准备只放一遍），还提出学习林彪的讲话。这样所有的人就都跟着林彪走了，而毛主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边倒，他感觉林彪势力太大了。

庐山会议之后，父亲的压力很大。从1970年8月，下了庐山，到1971年9月13日这段时间，父亲一直都在检讨。那时，他对毛泽东还抱有幻想，认为“自己是毛主席的人，毛主席是保他们的”，毛泽东也跟他说过“你们和陈伯达的性质有根本的区别，你们要好好学习、好好检讨一定能过关”这样的话。

#### ◇ “九一三”那天

“九一三”当天，父亲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就在9月12日晚上，按照父亲的工作计划，他接见空政文工团的6个指导员，解决13航校校长和政委不和的问题。到了晚上11点就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问是不是“有一架飞机飞到了山海关”，父亲回答“没调过飞机”，不久周恩来就接到了林豆豆的电话，便在第一时间第二次打电话严厉的问父亲，“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父亲也知道了问题很严重，回答：“说不清楚，需要查”，调查的结果是，果然有一飞机飞去山海关。这架飞机是林立果直接打电话给空军34师师长胡萍调的，没有经过父亲。父亲就打电话问胡萍情况，胡萍回答：“飞机是训练。”父亲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这时候父亲已

经知道，这架飞机和林彪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坚持到西郊机场查，周恩来也派了杨德忠一直跟着我父亲。从这时开始，父亲就在周恩来的直接监视下，也是直接领导下了。

到了西郊机场，父亲立刻打电话给空军 34 师师长胡萍和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命令飞机立刻飞回北京，并且不带任何人。胡萍和潘景寅之间通气，说飞机的发动机有问题，要修好之后才能回北京。最后一次父亲打电话给潘景寅说：“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起飞”，还说“你要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听周总理的命令”，在飞机没有起飞前，父亲还提出在跑道上放障碍物，周恩来没有采纳，他不能表态，只能选择沉默。

在那种紧张的时候，父亲和周恩来之间的电话就没有挂断过，飞机起飞的第一时间父亲就知道了，也是在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周恩来。飞机飞了，父亲就知道，他完了……当时，父亲的想法还比较简单，无非是政治上的淘汰，离开政治局到地方当个军区司令啥的。没有想到是现在的下场。

#### ◇ 写在最后

采访结束后，吴新潮对我说，“只说吴法宪的事情，是说不清楚那段复杂的历史的，吴法宪就是一个小角色”，关于“文革”、关于林彪，我们又聊了好久。

吴新潮说，“九一三”事件实际上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他没有预料到林彪会走这样一步棋。但实际上，不是林彪，而是林立果走了这步棋。没有林立果的参与林彪也不会走。我说过，红 1 方面军是毛泽东的中央军，红 1 军团就是“黄埔军校”。当然还有 4 方面军、新 4 军、白区党、2 方面军，直到 1 方面军的红 3 军团，文革到了最后把自己最核心的红 1 军团也搞掉了。毛泽东也明白林彪事件标志着文革的破产。

之后，他身边就真的无人可用了，最后只剩下“四人帮”，棋下到这儿已经很险了，翻盘的可能性很大。最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失败了。

~~~~~

#### 【几曾回首】

#### 李文化：江青“御用摄影师”悲欢史

• 张 欢 • 印 青 •

作为文革时江青最看好的电影摄影师，李文化参与了多部样板戏和“左倾”电影的拍摄，他的个人命运也随着政治运动而跌宕起伏

82 岁的李文化现在定居美国，到了可以自由拍摄电影的地方，但他已经扛不动摄影机了。

李文化有过被“文艺旗手”江青赏识的经历，多次被指派为“御用”电影摄影师。他导过样板戏电影《红色娘子军》，也因为导演著名的反击电影《决裂》和《反击》被批判，直到写信给胡耀邦，才得以恢复创作自由。

李文化的电影生涯处在政治与文艺无法分割的年代。崔永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在做《电影传奇》时，他发现那些电影界的老人们一张口，叙述就会从电影本身放大到时代背景——新政权的艺术政策和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

◇ “不要资产阶级的小桥流水，要无产阶级的大江东去”

1965年7月，当得知江青点名要自己拍摄《南海长城》时，李文化的心里只有激动。

北影厂的领导告诉他，江看电影《早春二月》时问身边人，这个片子的摄影师是谁，得知是李文化，江青说这个摄影师行。

这个评价有些困扰李文化。电影《早春二月》作为毛泽东点名的“大毒草”正被批判，李文化此时也在接受批判。北影厂批斗的主要对象是导演谢铁骊，作为摄影师，李文化属于陪斗者。

北影厂的大喇叭功率很强，经常会广播出“大毒草《早春二月》的摄影师李文化出来开会检讨！”他必须迅速赶到批判现场，念自己的检讨稿。批斗之后不能回家，要回到马棚，有工人在门外拿着木枪守卫。

李文化不算文艺黑帮，被定性为“黑线人物”。对于江青的赏识，他有些得意：主席夫人毕竟还是懂文艺的，她明白一个摄影师的水准。

《早春二月》在摄影美学上堪称经典，在上海滩当过电影明星的江青懂得李文化的功力。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时代里，文艺界也需要样板工程。《南海长城》成了江青的样板，她可以调动全国最优秀的电影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李文化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住所。江穿便装，齐耳短发，肤色白润，精神不错，看起来不像年近50的人。江青笑着说：“李文化！不要小桥流水，要大江东去；不要资产阶级的小桥流水，要无产阶级的大江东去！你拍的《早春二月》拍得不错嘛，色彩也很好，画面也很讲究。不过，你那是为资产阶级拍摄的，现在我要你来为无产阶级拍摄，怎么样？”李文化赶忙点头说：“是！是！”

江青请导演严寄洲和李文化等吃了一顿饭，简单却味道很好。席间，江青不住发出感慨，“培养你这样一个摄影师比培养一个飞行员还要难！”

因为种种原因，电影《南海长城》没能完成，人们之后看到的版本已经和李文化无关。虽然是一次不成功的拍摄，但李文化已经见识到“文艺旗手”对电影特别的爱好和“关注”。

虽然只是一部电影，但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经常会陪江青来视察。两人在前面走得很慢，江青往往走几步，就示意要休息一下，旁边专门的服务人员立刻把准备好的凳子放下来，旁边的人跟着停下来。几分钟后，站起来接着走，不一会儿，又示意休息。

李文化看着江青精神还可以，但想不到身体这么弱，听说还有病，“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整天和毛主席在一起，一切听从毛主席，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抓电影。和她在一起就有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感觉。”同时心中暗自给自己加压，“如果拍不好这部片子，就对不起中央，对不起毛主席。”

每天早上，片场里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他们不是为当天的拍摄工作准备，而是在背书。每人手里一本红宝书，都在抓紧时间背毛泽东的老三篇，这是雷打不动的早晨两个小时背书时间。

因为文革爆发，《南海长城》中断了。李文化没有想到，迎接他的将是一阵又一阵的政治冲击波，而这一切都源自他热爱的电影事业。

#### ◇ 拍摄批斗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摧毁文化的政治运动，在“文化”的旗号下进行。

李文化被狄福才叫去钓鱼台看电影。狄是8341部队副政委，此时是北影厂工宣队的领导。他告诉李文化，“江青同志请你们几位业务骨干看美国电影。”

江青召见了钱江、成荫、谢铁骊和李文化，明确表示：“以后要大家为无产阶级拍些好片子，主要是拍摄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红色娘子军》。”

江青鼓励这些年轻的电影人：“相信你们一定能拍好，在拍摄之前，我会亲自带你们看些美国片子；这些美国片子的内容和思想，我们不学习；我们主要学习它的技巧、技术。比如造型、灯光、场面调度、场景啊，为我们拍摄无产阶级电影所用。我们也要积聚一些力量，借鉴别人好的技巧为我所用。”

在钓鱼台的电影放映间里，外面还是革命小将的厮杀声，江青带着几个电影人开始观摩美国电影，其中不乏奥斯卡得奖的大片。

有时康生会陪在旁边，两个人在前面沙发上坐着，江青脚下放着一个小小的脚踏台，膝盖上搭一条毛毯。北影的4个人坐在他们后边。江青一边看，一边随意点评什么说给后面几个人听，有时候还来一个提问。导演方面的问题问谢铁骊和成荫，摄影方面的就问李文化和钱江。4个年轻人一边要集中精神看电影，一边还要支楞着耳朵听江青说了什么，一点也不敢走神。

电影还不错，虽然没字幕说英语。让他们痛苦的是江青说话时不扭头、不探肩，貌似自言自语，其实是在和后面的人说话。

此时的北影厂已经被军管，全厂男女老幼被从宿舍赶出来，要实施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跑步念语录。制影车间地方大，地上铺上木板，所有人不能回家全部睡大通铺，男的一个房间，女的一个房间。

4个年轻人每天晚上10点多要去钓鱼台陪江青看美国电影，看完两部再评点两句，回到厂里天都亮了，接着跑步念语录。

几天下来，终于有人坚持不住了。“钱江，你看过这部片子吗？”钱江已经眼皮打架，猛然间听到自己的名字，连忙回应：“是！挺好的。”江青回头环视一圈，声音突然提得很高：“什么挺好的！我问你们什么了？你们根本就没看！”

夜已深，钓鱼台会议室气氛紧张，江青披上军大衣，来来回回地踱着步说：“你们怎么在那儿睡觉啊，我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还有病，辛辛苦苦带着你们看电影，带你们学习，你们怎么睡觉打呼噜呢？”

有人忍不住告诉了江青真相，江很意外，通情达理地让他们回去睡觉。

几天后，他们又被抓来继续看电影。

李文化印象最深刻的是江青对电影《鸽子号》的评价。这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16岁的美国青年罗宾独自驾驶鸽子号环游世界一周，只有船上一只猫相伴，他在中途邂逅的19岁女友佩蒂则沿途遥遥追随，直至壮举完成。电影最后的细节是俩人一个在船上一个在岸上见面了，他们等不及船靠岸，跳下海拥抱在一起。

江青说：“要我是那个女的，我也跳下去。”

众人默然。

李文化起初分到《智取威虎山》，但江青等不及，又同时上了其他两部样板戏电影，他被分去芭蕾舞剧电影小组《红色娘子军》。

江青迅速推出样板戏电影，强调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电影不着急拍，先去考察生活。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领导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会议结束后，江青和吴法宪走到厅门口，突然把李文化和狄福才喊到她面前说：“李文化你们要去一趟海南岛看看，狄福才，你派人送他们，带上摄影机。”又对吴法宪说：“你明天给他们派一架飞机，去海南岛。”

第二天，李文化等主创就被空军专机送去了海南岛。几个主创人员懵了，要干啥？带着摄影机，可拍什么？要用实景来拍？拍实景的万泉河，实景的椰林？芭蕾舞剧到外景地去拍？

研究之后的结论是：实地拍摄外景，是不可能的，舞台布景丝毫不能更改，不可能在外景实拍。“江青的用意可能是让我们感受一下实景，体验一下生活而已。”最后花3天时间，把《红色娘子军》的实景都拍下来，剪接出一盘带子交给江青。

江青看了片子说：“拍得很好嘛！”3个人的心才落地。

之前一直是摄影师的李文化，在这部样板戏电影中担任了导演工作。在李文化的回忆中他提到另一位红色导演谢铁骊曾经来过一次，提过一些意见，然后就走了。

他在自传中声明：关于《红色娘子军》的报道有很多不实情况。当事人如舞剧编导李承祥、主要演员薛清华、摄制组制片主任等都健在，一问便知真相。

当时都是集体创作，所以李文化的名字没有打在银幕上，这也为日后《红色娘子军》导演名誉权的纠纷埋下了伏笔。

拍电影之前，李文化是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的摄影师，在他的新闻镜头里，有过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新疆剿匪等重大事件，而让他最难忘的是文革中拍摄批斗刘少奇的经历：

有天中午，狄福才跟我说，晚上下班你等我，有任务，拍什么到时候告诉你。晚上他来了才说去中南海拍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批斗邓小平和陶铸是新影的人去了，我们北影拍刘少奇。

到了门口，8341团长一挥手，我们就进去了，进去就到了一个门楼，很漂亮，四合院，

有厢房、正房，挺大也挺讲究的。狄福才交给我任务——你先进去，不要进屋，就在院子里等着，红卫兵过来时你就开始拍，我一个人就进去了。有个小女孩跑来跑去，应该是刘少奇女儿。正房有个大桌子，刘少奇就坐在桌旁，他背着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没拍过这个，害怕啊，随便拍哪儿行啊。后来红卫兵来了，我就开始拍。他们进去就给刘主席做喷气式，门口都是人，我忙得不可开交，从里面一直拍到他们斗到外面那个小广场。

中途刘少奇主席往板凳上一坐，张着大嘴直喘。他穿布鞋，把脚伸出来，一看鞋踩掉了一只。紧接着是王光美，却不让她坐。她耷拉着脸，下面喊，“王光美抬起头来！”她就不抬，她抬头人家不让她抬头，把她摁下去。

当时就一个想法，批判领袖人物，怎么跟批判一般老百姓一样，都做喷气式啊。是不是过分呢？

还有一个我不清楚，党的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怎么没弄清楚他的历史就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了呢？心情特别沉重……

“我就是一个摄影师”，这成了李文化心里的信条，尽管在厂里，有人说他是江青的红人，他一样保不住自己的岳母——荆阴阳头，发配老家。

直到今天，他也不愿意去否认一些事情，比如他对江青文艺水平的看法——“不能说她是毛主席夫人，拍过电影，就是电影顶尖专家，我不认为她是顶尖专家，但我认为她是懂电影的，她真懂。30年代她当过电影明星，当然要懂这些东西。她给我看过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坐在躺椅上，一张是林彪的照片。她专门给我讲，这些照片她在什么情况下拍的，怎么用光，逆光、侧光、正面光。她希望我拍出的电影跟她所要求的一样，石少华、吴印咸都是她的老师，这些人都是大师。”

◇ “拍武侠片，我是被政治搞怕了”

《海港》是另外一部样板戏电影，由谢晋导演和李文化摄影，但江青对最后作品很不满意，认为把她钦点的女主角李丽芳拍丑了，作为摄影师的李文化也因此打入冷宫，不受召见。起初他也苦闷，但没有伴君如伴虎的感觉，拍摄时也没有人指指点点，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他随后导演了《侦察兵》，并不觉得这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电影，但在当时，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3年的7年间，中国仅拍摄了13部电影，其中样板戏占了9部，故事片只有3部。《侦察兵》的出现，在当时也算是万人空巷，尽管后来又引发了一连串的批判。

初入导演界的日子是幸福的，在没人能拍片的年代里，他因缘际会可以实现自己的电影梦，但这是一个噩梦——《决裂》和《反击》引发了一连串政治问题。

电影《决裂》讲述的是极富时代特色的故事：某地党委决定办一所“抗大”式的农业学校——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校的师生分成两派，相互斗来斗去，革命派最后压倒了正常教学派。

李文化认为剧本有把握：“毛主席、周总理等许多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曾给共大写过信或题过词，明确表态支持，大方向不会错。”

电影公映后，一时成为舆论宣传的热点，被当权者视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艺作品，予以高度评价。几大写作班子都撰写了重要评论赞扬。

两位主演郭振清和葛存壮事后的回忆里，都不否认这部电影受到了“左”倾思想影响，又都承认创作人员的感情是真挚的。

因为这部电影，李文化被组织上安排拍摄《反击》，一部政治批斗色彩更浓的电影，反映工人如何占领高等学校，情节更离谱，没等上映，文革就结束了。

李文化随即遭到批判，北影厂成立了李文化专案组。

他尊敬的著名电影人、北影厂厂长汪洋在大会上高呼，“过去我们都说李文化老实、厚道、肯干，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他，他老实厚道为谁服务？他肯干，为谁干？！”要他老老实实交代如何与“四人帮”勾结的罪行。

电影《反击》是汪洋亲自抓的项目，散场后李文化路过汪洋办公室，生平第一次看都没看他一眼。制片主任王志敏走到汪洋身边，说：“你是看着李文化在北影成长的，大家如今这么批判他，你这样对待他，往后可叫他怎么办呢？”汪洋说：“怎么办呀？现在是没办法，运动过后，他还是照样当他的导演。”这让李文化心头一热：好人也有无奈时啊。

《决裂》主演郭振清，听说李文化被打成反革命，跑到北影厂大门前高喊：“我是郭振清，我就不相信李文化是反革命……”

有温暖也有痛苦，史X X是第一个通知李文化去拍摄《反击》的北影厂领导，现在却也成了他批斗的领导。

如今李文化年过80，很多是非已经不愿再谈，他女儿却记忆深刻：“1976年因为地震，大家都搬地震棚。崔嵬（《青春之歌》的导演）和我家隔一走廊。崔嵬就跟我爸说，你得小心这个姓黄的副导。他先给崔嵬当导演助理，文革一来，崔嵬挨批判，黄X X第一个跳起来打崔嵬、带头喊口号，还揭发，崔嵬特寒心。他跟我爸说，你小心点。我爸还不信。后来我爸的事一出来，他果然翻脸不认人，跳出来一摞一摞写揭发材料。”

因为电影而发生的这些是是非非让李文化无比痛苦。他写信给胡耀邦说明情况，最终得以平反。后来他拍摄了讴歌老干部的《泪痕》，还得了百花奖。

他厌烦了。改革开放后，投身到武打片的拍摄中。《金镖黄天霸》、《索命逍遥楼》成了当年票房冠军，在这个世界里再也没有政治纷争，也没有亲密战友的背叛，只有电影。

生性恬淡的李文化选择了退隐，他拒绝了一些邀请，没有频频在电影节露面或者回应一些纠纷。因为女儿的关系，他选择在美国安度晚年。

他说自己很羡慕那些可以自由拍片的导演，80年代伊始，他曾经和香港同行交流，很讶异对方拍片的效率：没有体验生活，没有不受时间控制的拍片要求，也没有层层审查，在商业规则下一切都在高速运转。

他很渴望能在那个制度下去试试身手。

也有很多次，他回想起当年的那个新闻摄影师：在天山脚下的沙漠里，几辆大卡车停下来露营，王震上将派来的战士和摄影师一起说说笑笑，他就睡在卡车的顶棚上，仰望着天空的星



星，生活里充满了红色激情。

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 《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期

~~~~~

【各抒己见】

“刘邓路线”的“前世今生”

• 缪一轮 •

—

这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贯以左派著称的王震访问英国。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访问了一位失业工人，却意外发现那位工人所享受的失业津贴、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教育、花园住宅、家庭设施……总之生活总体水平比他这个享有巨大特权的在职的中国副总理还高。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事实胜于雄辩，王震还是服膺事实的。他感慨地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可是问题是，“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还能够建成这样的理想社会吗？  
许多同志也许会说：“绝对不可能！”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把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为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政党，彻底放弃党国体制，认真建设民主宪政，那就完全可能。

那么问题又在于，中国共产党可能变成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政党吗？

我的回答是，如果真正兑现保护和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全体公民利益的承诺，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党内民主”的设想，把“权为民所赋”转变为一系列的实际操作和程序制度，中国共产党就能够完成自己的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政党。

也许更多的同志会说：只要能够建成英国那样的理想社会，我们又何必管他是哪个党执政呢？

这固然不错，但是从中国现在的实际出发，如果共产党执政能够在中国建成那样的理想社会，那么我们又何必舍近求远另觅他途，何乐而不为呢？这个观点，我估计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赞成的，而且我们一直怀抱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努力着、隐忍着、期盼着……。

然而，问题的症结是，作为副总理（后来还是共和国副主席）的王震的思维的逻辑是多么奇怪。既然人家在没有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建成了公正、富裕的“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什么咱们还要外加一个“共产党执政”呢？究竟“共产党执政”是目的、是前提，还是建成公正富裕的理想社会是目的、是前提呢？

30多年过去了，王震也早已作古——“俱往矣”，但是如今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思维的人

们似乎还大有人在。许多奇奇怪怪的观念意识和奇谈怪论大行其道，成为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难以逾越的障碍。

近读选网上刊登的信力健的《刘少奇：文革的受害者与始作俑者》（后又搜索到2006年选网转发的宋永毅的《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两文有许多段落连行文都完全相同），其基本观点我是赞成的。但令我困惑的是，文章似乎认为，文革前与文革初期并不存在一条不同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极左路线的右倾、反动路线，即所谓刘邓路线，相反，刘邓虽然是文革的受害者，但刘少奇（是否包括邓小平？）也是文革的始作俑者，文革的许多理论和做法诸如大力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导致亡党亡国和秘密串联、重组阶级队伍开展夺权斗争，以及逼供信等等，都源自刘少奇自己在四清运动中的发明创造。毛泽东几乎只是采用了以其人之道（或加倍）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请君入瓮”而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此，我又重新阅读了辛子陵先生《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的有关章节和其他一些文章、资料，深觉其观点触及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而且弄清楚这个问题，对破解我们今天的困局、扫除那些思维逻辑和观念意识的障碍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首先是掌握的资料极其有限，其次是学养不足，难以驾驭问题的深究，所以目前我对此的认识还极其肤浅粗疏，我的分析和结论难免谬误百出贻笑大方。之所以不揣浅陋敢于献丑者，不过是希望得到网友与专家们的指正，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我认为“刘邓路线”不仅曾经存在，而且其变种延续至今。

“毛左”们因此大呼“走资派还在走，而且越走越远！”

而追求宪政民主的人们又认为，他们顽固死守毛泽东的专制独裁思想不放，严重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

初步弄清它的“前世今生”的本来面目，就是本文的目的。

## 二

毫无疑问，建政之前，刘邓和毛氏的基本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与邓曾经一同遭受过“错误路线”的迫害（邓的“三起三落”之“一落”就是此时），邓被认为是铁杆的毛派；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上，毛也曾经得到过邓的大力支持；而延安整风中，毛更得到刘（与王明等同样具有留苏背景，这对于被称为“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者”的土包子毛泽东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的全力配合协助，从而奠定和巩固了毛在党内至尊无上的地位。刘少奇正是第一个在党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旗帜，铲平党内一切派别山头的领导人，并且毫无疑问，他也正是因为这个重大“建树”而得到了毛的最大信任，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党内超越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成为第二号人物和毛的接班人的牢固地位。

建政以后，对于是否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由于刘少奇与王光美一家等“剥削有功”的“红色资本家”关系过分密切，刘和毛的确产生过分歧，但是，刘在受到毛的批评提醒之后很快跟上了毛的步伐，而在后来抛弃《共同纲领》制定“五四宪法”、国际上“一边倒”、经济上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清洗所谓高岗反党集团、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偏离和抛弃中共八大路线、反右派、穷过渡、大跃进（大炼钢铁、总路线和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转折和政治经济活动之中，我们看

到的，的确都是刘邓对毛的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和他们在主持所分管的工作（例如反右派、四清运动）或在第一线全面主持工作中创造性发挥和实践毛的主张的突出表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毛对刘邓的高度信赖和回报。他的确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副手（他在“大跃进”中曾称邓小平为“副帅”）和接班人来培养和任用的。而真正像小媳妇一样小心谨慎伺候他们，不时遭到排斥和贬抑，却得不到他们的任何声援的，似乎恰恰是资历比他们都更高、长期主管外交和经济工作的周恩来。

可以说，否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就否定了刘邓。难怪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是绝不允许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他要否定的只能是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局部错误，以扫清自己继承毛泽东“一言九鼎”“乾纲独断”的“领导核心”的大位的障碍。例如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邓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用林彪、江青，反击右倾翻案风，把他打成“邓纳吉”等等。所以，在批判了两个“凡是”以后，邓又更高调更强硬地提出了四个“坚持”；在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断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抵制“西方文明”这样的“阶级斗争”，直至走到“没有退路”也无法回头，以武装保权护驾的尴尬境地。

### 三

那么，难道“刘邓路线”与毛氏路线毫无二致，而只是毛氏捏造的“莫须有”的罪名吗？毛发动的文革仅仅只是为了掩盖饿死三千七百万人的失误、扫清他建立毛氏家天下，即争夺接班人继承权的“权力之争”吗？

我认为，平心而论，大跃进、饿死人的所谓“七分人祸”是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氏个人的，毛与刘邓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恩来由于不断受到批评，被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政治设计院”和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中央经济领导小组架空而靠边站，因而责任较小，大跃进的失误反而反衬出其之前的“反冒进”是完全正确的）。刘邓在高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时的许多比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高调言论都是有案可查的。当然，毛氏个人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狂热性”和主观轻率、脱离实际、独断专行、动辄用组织手段打击与自己意见稍有不同的领导干部（如严厉处分高扬），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他必须承担最主要的责任。然而，实事求是地说，那时候的刘邓在毛面前还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他们对毛的急躁冒进如果有所抵制，而不是添油加醋、雷厉风行地“有力贯彻”，对周恩来的“反冒进”如果有所支持，周自己也能够实事求是有所坚持，而不是毛一批就做检讨，那么毛泽东断不致于在乌托邦的狂热梦幻中走得这么远。所谓“一言九鼎”“乾纲独断”的地位和局面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而这个过程正是刘邓和周等形成的合力促成的。尤其是当庐山会议大多数人对这个重大失误有所认识并准备加以纠正的时候（那时候饿死的人也还不多），毛不应该因为讳疾忌医而拿彭老总开刀，掀起反右倾的狂潮。但是，在打倒彭德怀时刘仍然是站在最前列的，他不但不支持彭老总，为彭老总分担压力，共同顶住陈伯达、康生、柯庆施、李井泉等小人的煽风点火，婉言劝告毛泽东，反而火上加油，搬弄是非、扩大矛盾。刘甚至在批判彭老总的时候上纲上线、任意发挥、大放厥词，说什么“我就是要搞个人崇拜，不但搞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还要搞林彪、邓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与其你搞个人崇拜，不如毛泽东同志或其他同志搞个人崇拜”，“如果你篡党，我一定篡；你不篡，那好，我也可以不篡党。”

我不知道在批判彭老总的时候刘少奇是怎么扯到篡党的问题上去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解决工作失误的问题的，但是毛和刘“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这股弦都绷得很紧，以致都非常敏感地联系到了权力斗争，甚至提到了篡党夺权的尖锐程度。这显然是彭老总万万没有想到的。而刘又把他自己摆到了与毛同等的地位，似乎攻击他就是攻击毛，批评毛就是批评他，他与毛完全可以不分彼此。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想到了他手下或身后（即他的接班人）的林彪和邓小

平（但没有提到周恩来朱德陈云），以致提前为他们定位，言外之意似乎是“不论如何篡党夺权，怎么也轮不到你老彭！”但没想到却因而触动了毛泽东另一条敏感神经，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从而为自己日后招来了杀身之祸。辛子陵先生分析说，在紧跟毛这一点上，周恩来和刘少奇的区别是，毛说了一百分，周绝不说九十九分；而刘却一定要说一百零一分、一百零二分，甚至一百零三分。难怪毛泽东从中听出了另一番滋味而形成了刘少奇总是以“左”掩盖“右”因而居心叵测的初步印象。

七千人大会及其以后，为什么唯独毛氏要一个人独自承担饿死人的罪责而千方百计来掩盖它搅浑它推卸它呢？难道这个时候，刘邓已经自认为可以撇清自己的责任而获得了某种主动权了吗？还是刘邓也像毛一样文过饰非，企图把“七分人祸”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头上，以便于自己顺利接班甚至提前接班？这是否正是毛对刘邓极其不满的重大原因之一？对此，我认为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但是，集中表现在经济体制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上，刘邓的“三自一包”（不可能与周无关，但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包括毛泽东都把它——不论当作功还是过——都一概记在刘邓的头上）虽然挽救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帮助党摆脱了当时的巨大困境和政治危机，然而却是不符合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胃口的。我以为毛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起初主要就是指这个东西。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刘邓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人心，其威望在党内外空前提高。这又不能不更进一步引起毛“大权旁落”的敏感和对他们终将篡党夺权的警觉。

#### 四

当文革之初，刘邓会错了毛的意思而按照毛的一贯思路和所谓阳谋，派出工作组对自发的造反派（而不是后来毛派扶持和培植的造反派）大打出手的时候，毛已经不按其一贯的套路出牌，这才通过《炮打司令部》划分出了一条不同于毛氏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在我们看来，刘邓的这条路线就是毛氏反右派、反右倾的一贯路数，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肆无忌惮地迫害对党和政府以及官僚老爷极端不满的部分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与毛的一贯思想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当然，毛和刘在尺度的掌握上和重点的指向上是有区别的，刘邓的确有时候似乎比毛显得更“左”。

例如1957年整风之初，刘邓因为唯恐“右派”（那时候虽然还没有这个作为罪名的专用名词，但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刘邓的心目中却是一直存在的）翻天而心存疑虑，并不积极赞成毛泽东放手让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我党整风，毛泽东一开始还不得不“苦口婆心”一再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以打消他们的顾虑。及至毛氏突然打出“引蛇出洞”的“阳谋”的旗子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他们才顺心遂意地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邓小平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反右派运动的最积极最坚定最得力的急先锋和主持人（领导小组组长），这也正是文革后胡耀邦要彻底为右派平反而得不到邓的全面支持（最后只能为“反右扩大化”改正）的原因。

又如，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在“阶级斗争熄灭论”指导（还是反讽？）下施行残酷的“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或者特权阶级）专政”。他不知道得到谁的授权，根据什么组织原则和程序，竟然开创“夫人参政”的先例（后为毛泽东实施其扶持江青参政乃至接班“主政”的大阴谋所利用），派出自己的老婆化名蹲点，秘密扎根串联、重组阶级队伍、展开夺权斗争，取得了所谓“桃源经验”，成为后来文革的小规模的成功预演。由于毛氏当时对所谓“四不清”还比较“温和”（其实他的关注点不在党外而在党内，不在下层而在上层，不是什么已经被打倒的死老

虎——地富反坏右，和并没有多少权力的基层干部，而是党内当权派），所以这些使刘和其夫人洋洋得意的政绩在得到毛氏的含糊肯定之后又被他讥之为“形左实右”。高高在上的刘邓，自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当然代表，其斗争的矛头一贯是向下的，他们当时哪能够想到，自己竟然有一天会成为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然而从专政思维的角度来看，显然他们比毛“毫不逊色”，也毫不手软。

其实，文革之初毛氏生怕他煽起的风点起的火过早地停息和熄灭，是要借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收买人心，组织他自己的基本队伍，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之火延烧下去，以便一举打倒和消灭刘少奇以及拥护他的所谓“民主派”而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和刘邓的真正原则分歧是存在的，但是并不在是否实行什么专政上，而是在七千人大会以后形成的、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的所谓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而刘邓在政治体制特别是坚持党国体制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与毛氏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也很难说清谁是谁非、孰优孰劣。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对底层群众和基层干部甚至比毛氏更左更残酷更无情。

在我看来，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与他的集权独裁专政思维本来是存在尖锐的内在矛盾的，是水火不容、难以调和的。但是，他一贯宣扬的“人民创造历史”、“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造反有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论断所表达的民粹主义思想，却助他借其领袖的魅力把青年学生和工人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为他冲锋陷阵，出神入化地溶入了“马克思+秦始皇”、“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的党国体制的“群众专政”之中，并成功地运用其发动文化大革命，掀起“大民主”的急风暴雨和狂风巨浪（其实今天“毛左”们留恋的就是这些东西）。而在他的心目中，刘邓已经蜕化为一班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政客，因此他们的专政不过是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对群众居高临下的专政。

然而归根结底，把自己当成救世主的毛泽东，除了像列宁斯大林一样能够把“一半人”送进地狱之外，又怎么可能把另一半人送进天堂呢？“红卫兵”“造反派”后来的命运就充分说明了一切。所以从本质上看，他的“群众专政”路线也绝不比刘邓路线更高明更温和更仁慈。

总之，在我们看来，在政治路线上，它们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反民主、反自由、反公平、反正义、反人权、反人类的。

## 五

综上所述，刘邓路线就是在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路线。

在政治上，即坚持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国体制这一点上，他们与毛泽东是没有根本分歧的，这也绝不是毛泽东要打倒他们的真正原因，相反这恰恰是他们始终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

在经济上，他们主张在中国适当发展资本主义，这却是毛泽东坚决不答应的。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文革前的“刘邓路线”做出了一些“与时俱进”的重大调整，他一面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面提倡市场经济，提倡“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不讲原则的），他把这个主张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当然知道，按照毛泽东的观念，这其实仍然是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这当然逃不过“毛左”们的法眼，所以他只好采用“姓社姓资不争论”的策略来回避“斗争”。辛子陵先生与许多同志都认为这是邓小平被迫“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并且认为这个策略如

今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已经完全失灵。过去我也同意这一看法。但在认真思考了“刘邓路线”的“前世今生”之后，我以为“打左灯，向右拐”的概括并不准确，至少不够全面。因为这么说，好像他们的“左”是假的，“右”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和根本目标。

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误解（也许这也是辛子陵先生们的一个小小的策略？），带着这个误解去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试问，为什么当大家都认为“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不但不改弦更张，反而真地“向左拐”了呢？当然，他们并没有按照“毛左”的希望退回到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上去，而是更加坚决地执行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其实，他们的“左”是十分真诚而坚定的。他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心存畏惧，生怕葬送了共产党的领导，因而一再宣称必须坚持一党领导的党国体制，绝不搞三权分立，强调发展民主绝不能像发展市场经济那样不问“姓社姓资”，而一定要分清“姓社”还是“姓资”。这显然不只是“打左灯”糊弄“毛左”那么简单。他们坚定地相信，在党国体制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战胜民主国家难以战胜的经济危机，可以迅速做到“大国崛起”、超过日本赶上美国称雄世界，可以避免诸如总统竞选、多党竞争、民族自决、地方分裂等许多政治麻烦和所谓“民主乱象”，等等。因此，他们为中国模式、中国特色而骄傲。至于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群体事件，在他们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党国体制完全有能力加以有效的控制（当然不是消除，因为把权力和财富集中垄断在他们手里，本来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因此，“政左经右”的提法也许才更符合实际。

当然，这里的“左”和“右”也只是借用人们的习惯用法而已。这里的“政左”指的是一党专制的党权国家体制，而“经右”指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知道，在专制体制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的，我们看到的只能是被扭曲了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而它的严重后果就是公平正义的丧失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维持政局稳定，这条路线必然的选择是不断加强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但是由此又必然带来公平正义的更多丧失和更大的两极分化的更加严重的恶果。而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恶性循环是党国体制无法克服，而必然导致它最后走向崩溃的。

刘少奇为这条路线这个体制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遭遇证明，这条路线这个体制连他这样的贵为国家主席的强势个人都保护不了，顷刻之间他就变成了孤立无援的最最弱势的个人，那么还有谁是安全的呢？其实，就是当年的太祖皇上毛泽东也感到并不安全。起先，他是觉得大权旁落，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安全，后来，他是为自己身后的功过评价而担忧，恐怕中国的赫鲁晓夫像对待斯大林那样对他全盘否定（所以他才要将刘少奇置于死地而后快），再后来，他真地差一点把自己的老命葬送在被他逼走的林氏父子手里。

今天，许多头脑清醒的官员也觉得自己已经沦落为从事“高危职业”（巨大的利益与巨大的风险同时并存）的“弱势群体”，在专制体制腐败的官场上他们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清廉勤政务实不但不能自保，反而可能招祸；而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参与贪腐的最后结局必然是受到清算（哪怕是迟到的身后清算）。我们普通公民，也只能以牺牲自己的言论自由为代价换取人身安全和家庭平安，像“做稳了奴隶”似地苟活于世。

我以为，这不是“打左灯，往右拐”的策略走到了尽头，而是“政左经右”的“刘邓路线”和党国体制走到了尽头！

当然，我这里描述的只是事情阴暗的一面。另一面是，中国人的脊梁并没有断尽，有的人正在挺直、挺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 原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www. cnd. org/](http://www.cnd.org/)

---